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当代 社会主义实践

MAO ZE DONG ZHE XUE SI XIANG
YU DANG DAI
SHE HUI ZHU YI SHI JIAN

主编 蔡德麟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当代 社会主义实践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怀超

封面设计：诸卫国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

主编：蔡德麟

编委：程伟戎（常务）

何 迈 翟东林

吴 忠 庆跃先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霍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2 字数：400千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3500

ISBN7-212-00527-4/B·43 定价：6.50元

目 录

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龚育之（1）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杨春贵（22）

学习《矛盾论》正确观察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刘 嶸（32）

毛泽东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陈祖华（43）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旗帜……………苏厚重（53）

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新课题……………庄福龄（62）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刘敬诚（74）

坚持《决议》的正确方向

——从“毛泽东热”说开去

……………蔡德麟 刘哲静 吴 忠（85）

晚年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石仲泉（100）

毛泽东的晚期思想研究之思考……………许全兴（111）

评析“寻找毛泽东”……………韦日平（121）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歪曲

——批判“变构论”、“过时论”、“封闭论”

……………雍 涛（129）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灯塔

……………江汉亮 吴兆雪（141）

邓小平改革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突破·····	姚传旺 (147)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杨耕 陈志良 (154)
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	胡为雄 (167)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郭建宁 (175)
学会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 ·····	王怀忠 (186)
“两论”仍然是我们新时期“起家”的法宝 ·····	赵正永 (195)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	沧南 (203)
论毛泽东的改革思想及其哲学思路·····	李君如 (213)
关于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几个问题 ·····	汤文曙 房玫 (224)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方法论初探·····	魏名国 (231)
论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思想·····	杨保仁 (241)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真理观·····	刘林元 (249)
从结合运用的角度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	毕剑横 (258)
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	何迈 金志华 (266)
努力加强哲学同社会主义的结合 ——毛泽东哲学活动的启示·····	程伟戎 (276)
群众路线的新篇章·····	林伯野 (286)
我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理论与 实践·····	杨梅叶 宋一秀 (294)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	赵率真 (304)
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驳“社会主义失败论”·····	商孝才 (310)
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刘利华 (320)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与社会主义改革·····	谢道文 (332)
略论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问题·····	周振国 (342)
试论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庆跃先 (349)
防止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	唐洲雁 (358)
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稳定·····	鲁修文 (366)
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问题的历史思考·····	于云志 (375)
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	李海平 (386)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	李大林 (391)
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理论 ·····	樊瑞平 王立胜 (397)
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思想初探·····	邓兆民 (408)
毛泽东的可能性理论和两条道路矛盾学说·····	陆剑杰 (421)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	胡延风 (434)
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三题·····	苏平凡 (444)
论内因优化 ——对金寨县扶贫开发的哲学思考·····	傅启国 (449)
谈谈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法·····	何永炎 (457)
培养实事求是的品格、意志和能力 ——重读《实践论》·····	茆家培 (467)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	杜金泉 (471)
浅析“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方辉锦 (482)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深化改革·····	陆云彬 (489)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抉择·····	金邦秋 (497)
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思考·····	王敬烈 王一勤 (502)
第五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综述·····	吴忠 (510)
后记·····	(519)

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

· 龚育之 ·

首先说明一点，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参加学术讨论的个人意见。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听了大会的发言，看了大会印发的部分论文，产生了一些个人的想法。我的想法，同别的同志发表的意见，很多相同，也可能有些不尽相同。学术讨论嘛，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或侧重不同，或视角不同，或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或思考问题的背景不同……因而就需要交换看法，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下面我讲几点意见。如有不对，请大家批评、纠正。

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是理论工作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毛泽东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罗璫阶信》）。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先驱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也写到了我们队伍的旗帜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旗帜？当然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

近年有一种思潮，主张淡化“主义”，认为事情该怎么办办了就是了，政策该怎么定了就行了，规划该怎么搞搞了就完了，何必非讲什么“主义”？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五四”时期就有“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提出一个口号，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般而言，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还起草过《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少谈些‘主义’”，当时的现实针对性，就是反对人们谈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辩驳。今天主张淡化“主义”，现实的针对性，仍然是指向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赞同。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要务实，今天也确实有许许多多问题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去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戒空谈”，“少说空话”。但是，淡化“主义”，不谈“主义”，这不行。没有“主义”，就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前进方向；研究和解决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也就会失去怎样为“该”怎样为“不该”的共同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树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中央的一条根本方针，就是在总结经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继续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写在我们队伍的旗帜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关系到我们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从我们的旗帜上拿掉，那就会否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会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丧失我们今天的基本立足点，也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经过去年我国的风波和国际的变局，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尖锐性，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方针的正确性、远见性，大家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确定

的政治含义，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就必然会（事实上也是）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和党的指导思想。应该指出，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和我们党犯过的错误，这是完全必需的；从学术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这个观点、那个论断提出意见，展开讨论，也是完全允许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事业，反对我们党的领导和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态度要鲜明，立场要坚定，把握要准确，方法要科学，要做长期的教育和斗争。

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工作，要由整个理论界来做，要由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来做。在这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仅仅拿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出版这一件事来说吧！《历史决议》作出以后，相继编出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2年12月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12月出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12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集（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诗词选》（1986年9月出版）和《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8年出版）。还在内部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和多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选集》四卷的修订本已在准备中。这些事实说明：党中央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创造条件，做了许多工作。至于我们的研究会，自《历史决议》通过以来已经开了五届全国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这一个事例也说明：我们理论界的许多同志在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方面是认真的、努力的。当然，理论界的同志们都还希望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多，更好，更有实效，更富于创造性。

《历史决议》应该成为我们研究

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

这句话，是1981年10月我在第一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发言的题目。这个看法，不是个人的创见，而是大家的共识。当时，《历史决议》刚刚作出不久。但这句话并不是一时的应景话，我以为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所以，再来谈一谈。

说新起点，就意味着要区别于旧起点。既不是“两个凡是”那个起点，更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个起点，也不是“文革”以前林彪的“顶峰论”那个起点。

说新起点，就意味着要有新高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历史决议》，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要站在这个新高度来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

新起点、新高度，新就新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在新的历史阶段有新的发展。我们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始终站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活动及其发展的基础上，而不能站在离开这种实践的别的基础上，比如说，不能以国外的研究为新起点。

这些年我们翻译出版了国外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许多著作。总的说这是件好事，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在党史研究工作中的一种具体表现。研究毛泽东思想也要面向世界，了解别人有什么材料，有什么观点；否则，眼界不宽，也会有局限。应该承认，即使在材料方面，国外的研究有时也可能占某种优势。比如，战争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同外国记者、外国官员谈话，当时我们可能没有保存记录，但他们保存了，而且发表

了。这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至于在观点方面，国外的研究更会给我们不少启发，正面、侧面、反面的各种意义上的启发。这些我们都应该了解。但对国外研究提供的材料和观点，我们一定要分析，要鉴别，使用的时候要慎重。

举一个例子：国外有材料说，1970年毛泽东曾经对人说：“我就象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个材料在国外用得很多，因为有形象，又耐人寻味，很可以做文章。而且材料似乎很可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提供的，见之于斯诺1970年访问中国后写的《漫长的革命》一书。然而，这个材料不准确。1970年12月斯诺确实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作过一次长谈。据斯诺说，毛泽东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说到他是“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其实，这完全是由于语言隔膜而产生的一大误解。这次谈话，包括毛泽东送斯诺到门口时的谈话，有详细记录，档案全部保存着。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四个伟大”表示讨厌，还谈到他不满意的其它一些“个人崇拜”现象。然后，毛泽东问斯诺，在北京的那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给你谈了这些情况？斯诺回答说，他们说了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你这么坦率。毛泽东说：“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斯诺懂一点汉语，但水平不高，谈话要通过翻译。“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是句歇后语，还带一个谐音字，没法翻译，结果造成误解。斯诺错误地从字面上理解“和尚打伞”，并把它领会和演化为“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于是外国不少研究者把“云游孤僧”当作毛泽东自己描绘的形象和自己表白的心境，据此来谈论毛泽东的孤独感。毛泽东的心境可以不可以研究？当然可以。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某个时候可不可能产生孤独感？当然可能。研究、分析、描写毛泽东的心境，并无忌讳。只是所依据的材料应该可靠。由误解“和尚打伞”这句歇后语而来的这个材料，不能用作描写

和研究毛泽东孤独心境的依据。

国外研究的观点，有一类是属于反共性质的，另一类以客观研究自许。前一类观点先不谈它，后一类观点应该如何看待？尽管这一类观点中会有不少可资参考、借鉴和吸取的内容，我认为，也是一要了解，二要分析。分析要立足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来加以检验，而不能因为新鲜就照抄。我看不要过高估计国外研究者的观点的价值。说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话有没有道理？有一部分道理。当局者的确有时不如旁观者清醒。“个人迷信”盛行的时候，我们许多当局者是不清醒的。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当作认识的定则，认为在研究人民革命历史的时候，旁观者就是比当局者高明，我看那也不符合事实。从实践论的认识论来讲，在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人们中，归根到底，还是那些投身于人民革命实践之中，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能保持对事物的科学态度的“当局者”，要比那些远离中国革命实践乃至对革命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的国外“旁观者”，更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更能揭示和认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理。

总之，对国外研究的材料要掌握、要鉴别，对国外研究的观点要了解、要分析。而这些工作，要由我们这些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学者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来做，站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来做，以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在新阶段的新成就、新发展为新起点，做出我们自己的分析，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至于另外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诸如用所谓“恋母情结”、“仇父情结”来对毛泽东作“精神分析”，甚至认为这些“情结”就决定了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决定了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由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类以“新研究”为名的东西，不但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全然无干，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十分有害。我们在新起点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必

须注意加以抵制，加以批评，引导青年研究者不要走那条路，而要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立足于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

要尊重《历史决议》的权威

强调以《历史决议》作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要尊重《历史决议》的权威。所谓《历史决议》的权威，一个是指组织权威，一个是指科学权威。《历史决议》是党中央全会郑重通过的，它有组织权威。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有义务、有责任尊重它，遵守它，不容许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宣传同它相违背的观点。《历史决议》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所以它有科学权威。两种权威，根本上是科学权威。没有科学权威支持的组织权威，终归不能持久。中国共产党是尊重科学的党，是坚持人民利益的党，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所以，党的组织权威从根本上总是由科学权威来支持、以科学权威为依据的。同时，党又不是一个学会，不是一个争论俱乐部。党所追求的真理，不是一个物理学定理，不是一个考古学判断，而是涉及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革命运动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要探明，而且还要以此来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指导全党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这样的科学真理，必须由组织权威来支持，才能变成行动的力量。

从总体上讲，从根本上讲，《历史决议》是符合历史真实而且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它是在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60年历史尤其是建国30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来的，又经受了它产生以来近10年实践的检验。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事业的开拓，有目共睹，这说明《历史决议》确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10年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波折，以至于去年那样的政治

风波，则从反面证明了《历史决议》做出的根本判断是正确的。拿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来说，《历史决议》恢复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判断，但又不是简单地恢复它，还总结了这以后20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经验、新思考，以及在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形势某些波动下轻易抛弃“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矛盾判断的教训。《决议》根据实践中造成的破坏后果，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中那些超过真理界限、扩大化了以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断，同时对那些没有越过真理界限的、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论断，包括不很完整但值得重视的论断，又予以肯定。《历史决议》作出的完整结论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去年的政治风波，正是证明了《历史决议》的这个结论非常正确、非常有预见性。当初《决议》写上这些话，并不是从现成的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讨论、慎重斟酌才写上去的，是作为对事物发展可能性的理论预测写上去的。我们工作中出问题，不是因为《历史决议》的论断和预测错了，恰恰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一贯地遵照《历史决议》的论断和预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尊重《历史决议》的权威，并不是说《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已经穷尽了真理，不需要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不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关于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真理，开辟了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但并没有结束真理。不仅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探求，就是对历史的认识也还需要发展，还需要向深度发展、向高度发展、向广度发展、向丰度发展、向细度发展，发展的余地还很大。但是，这一切的发展，都应该把《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科学真理作为起点、作为基础、作为主体，而不是抛弃它，不是在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样的根本问题的判断上改变它。真理发展过程中，新旧认识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基本的类型：（1）原来的认识基本上是错误的，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某些真理，那么，新的认识就必须把原来的基础推翻，然后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2）原来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新的认识就要把原来的认识作为核心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向纵深丰广方向发展。不能认为只有前一种模式，才能发展真理。如果不尊重已经得到的真理，认识就不能积累，不能前进。我认为，进一步加深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属于后一种类型。无论哪一种类型，都应该以《历史决议》为新起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进展为新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理论和事业推向前进。

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

开来是我们现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前提

《历史决议》以实践为标准，对毛泽东的党中央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检验和分析，把其中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的理论，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是这一科学成果的主要总结者和代表人物；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叫“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为“文化

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认定为错误的理论，不包含在“毛泽东思想”之内。这样就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这样的区别，是以实践检验为基础的是非的区别，不是单纯按时期划分的区别。有了这样的区别，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我们赞成什么、我们反对什么，我们坚持什么，我们抛弃什么，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生活中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而不再互相纠缠。

当时为什么要做《历史决议》呢？最现实、最迫切的，就是需要给“文化大革命”作出历史结论。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束“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民的呼声和历史的要求。“文化大革命”10年的中国，政治上动乱不已，经济上濒于崩溃，刚刚整顿有点转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整顿，实际上是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坚持“文化大革命”，“批邓”是势所必然的。按“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继续搞下去，动乱无休无止，非亡党亡国不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社会主义以“文化大革命”为楷模，那还有什么优越性？怎么能够得到亿万群众的拥护？所以，“文化大革命”非结束不可，非否定不可。然而，结束“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文化大革命”结束？

通常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对的。因为“四人帮”一打倒，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结束了。现在讲“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从1966年5月16日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的。但是，应该看到，当时不但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反而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又

一伟大胜利”。

“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十一大”的贡献。但是，当时仍然高度评价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它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把这个“理论”当作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贡献”。“十一大”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而且仍然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所以，“十一大”虽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深刻转折。全会的文件中没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停止了对“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宣传。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作结论。

只有到了《历史决议》，才郑重地、正式地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历史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从而从实际行动上到思想理论上完全地、彻底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由粉碎“四人帮”到作出《历史决议》，结束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经历了长达5年的过程。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伟大的前进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柳暗花明”的新时期，就是以这一转变为历史背景的。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胜利。

这一转变过程中人们遇到的困惑，就是这样一个两难局面：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